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下册

朱成甲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朱成甲编

(下册)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下 册

朱 成 甲 编

责任编辑：黄鹤逸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56,000 印张：20 印数：1—21,400

统一书号：3109·507 定价：2.55元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李良志 (1)
- 整风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宋金寿 (35)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侯天岚 (57)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张 扬 (71)
- 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肖一平 郭德宏 (85)
-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栗 裕 (118)
- 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索世晖 (147)
- 关于百团大战的探讨……………朱锡通 (163)
- 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孙风云 徐首军 施振兴 (176)
- 皖南事变……………何 理 (191)
-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唐曼珍 (22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从抗战结束到内战全面爆发期间的几个

- 历史问题……………姚 旭 徐 燕 (245)
- 论“和平民主新阶段”……………王年一 (270)
- 解放战争初期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何 泌 (293)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郭绪印 (308)
- 论“一二·一”运动……………沙健孙 (320)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的斗争……………方 亭(345)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关于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经验……………廖盖隆(363)

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刘裕清(400)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可能

性及其实现……………燕 凌(431)

试论一九五五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

争论……………强远淦 林邦光(466)

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李仲英(482)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

执行情况……………柳随年(497)

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张天荣(523)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王洪模(545)

附 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贺秦华 刘桂香

中央军委沿革概况…………… 阎景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军、八路军、

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序列…………… 马俊海 马增浦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

发展沿革简表…………… 马俊海 马增浦

李良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形成及其特点

原载《教学与研究》一九八一年

第一、第二期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组织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但是，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大的发展阶段来看，可分为两段：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宣言”发表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萌芽时期，是进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时期；从“八一宣言”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是主要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时期。

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宣言”发表前，从党的统战主张、口号的发展来看，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是一段。在这一阶段，党提出的统

战口号，是“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①。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可说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

但是，当时党所号召的民族革命战争，同以后所号召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不同的。当时的民族革命战争，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也不包括地主、资产阶级。所谓“民族革命战争”，实际就是“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②。当时党不仅号召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而且号召打倒一切国民党势力，认为推翻国民党统治，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因此，虽然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战，一二八事变后，蔡廷锴、蒋光鼐等在上海抗战，但我们并不承认他们是真正抗日，更不考虑应该联合他们。对马占山，我们骂他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③。对蔡廷锴，我们骂他“狡猾并不亚于蒋介石”、“从连长一直到蔡廷锴，没有一个长官是好的”^④。十九路军在上海浴血苦战，我们不去全力支援，却错误地去搞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斗争。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实际上是劳动人民联合抗战的口号，是人民阵线的口号。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由关外侵入关内，占领山海关，进犯热河、察哈尔、绥远，开始了对华北的侵略。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王以哲等，率部进行英勇的长城抗战。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一面破坏长城抗战，一面积极部署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通电》1932年4月。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1931年9月。

③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

④ 《与十九路军士兵谈话记录》载《红旗周报》第35期。

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这个文件表明，党的统战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所提“民族革命战争”，仅是号召劳动人民联合抗日，而“三条件”^①下的联合抗日，则包括全国的一切抗日武装。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三条件”仅仅是作为策略口号而提出，其目的一是为了揭露蒋介石诬我“捣乱抗日后方”，一是为了揭露某些军阀势力高喊“团结抗日”的假面貌。当时党断言，任何国民党军队，都不可能在“三条件”下，同红军订立抗日协定。

正因为当时党对“三条件”的提出，持这样一种出发点，所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并表示愿同我合作时，我们是十分不信任的。《红色中华》报不断发表文章揭露冯玉祥，说他组织抗日同盟军，是“高挂抗日反蒋旗帜”，“藉着这抗日的招牌，欺骗士兵民众，掩盖他勾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绥远，以便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的阴谋”^②。吉鸿昌当时忠诚抗日极为突出，他甚至卖掉家产来建立抗日武装。但我们却说他不过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敌人，是冯玉祥派来的代理人，怀有阴谋来同我党合作。

一九三三年冬，正当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蔡廷锴等率领的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并主动要求同我党合作。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是我党实

① 一、立即行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如集会、结社、罢工、出版等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② 《红色中华》报第105期1933年8月25日关于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报导。

践所提“三条件”，同国民党统治势力所缔结的第一个统战性质的协定。当时十九路军共有四万多人，如果真正做好了同他们的统战工作，我们完全可能打破蒋介石的这次“围剿”。可是，当时我党仍旧是不信任他们，认为蔡廷锴等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是最危险的敌人，其所作所为不过是“空喊革命口号”^②，“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③。当蒋介石大举进攻福建人民政府时，我们不仅见死不救，坐视失败，而且还大骂蔡廷锴等“一闻枪声，即鸡飞狗散”、“丧魂落魄”^④。

从对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两个事实中，可以看出，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我党提出的统战主张，虽同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革命战争”口号有较大区别，但就党的统战思想而言，仍未超出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我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著名的抗日六大纲领^⑤。文件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签名拥护的达几十万人之多。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标志着党的统战思想的新发展。文件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号召全体武装大联合；文件虽也揭露了国民党的卖国性质，但不再坚持推翻国民党是进行民

① 《福建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红旗周报》第63期社论。

② 《红色中华》报第133期关于福建事变的报导。

③ 《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12月5日。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福建事变宣言》载《红色中华》第149期。

⑤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共同打倒日帝。

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文件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主张联合日本的一切敌人，联合对中国抗日抱同情、援助或善守中立的一切国家和民族；文件提出建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抗战的总领导机关，这是后来所提“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的萌芽。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其统战思想同“民族革命战争”口号比较，同一九三三年一月所提“三条件”比较，都已大大地前进了。但这个文件提出之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激烈斗争之时。文件于九月二十一日才在《红色中华》报上刊出，十月，工农红军即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文件所要求进行的实际统战活动，基本上没有展开。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的统治权的无理要求。蒋介石再一次屈服，相继订立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使日本实际控制了冀察两省。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以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规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同以前的统战口号、主张相比，有许多特点。宣言不再是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行各业各个民族的联合。宣言提出了“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宣言虽未把蒋

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以内，但却号召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一九三四年所提六大纲领，更为完善。宣言的发表，不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真诚地要求付之实践，要求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并表示我党愿作发起人。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党的统战工作，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力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阶段。

过去评价“八一宣言”，批评它未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又缺乏阶级分析。其实，这并不是宣言本身的问题。在宣言中写上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完全不适当的。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党关于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也没有提国民党应服从共产党领导，相反是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宣言中搞阶级分析，给统战对象划左、中、右，进步、中间、反动，也是极不妥当的。我们不能要求“八一宣言”同时又是党内指示，混淆公开统战宣言与党内指示的界线。毛泽东同志过去对“八一宣言”的评价是很高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对“八一宣言”也作了肯定的评价。

九一八事变后，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是非常明显的；但正确路线又是什么呢？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怎样进行的呢？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简单化的，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九一八事变后统战问题上的极左政策，都归之于王明等人；把统战方面的正确主张：如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

作战的基本纲领》、一九三五年的“八一宣言”，又归之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其实上述文件，并不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而是由当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提出。迄今为止，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八月，还没有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讲话。

应该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是正确的，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分析，也有不少极为可贵的观点，如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他提出民族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未捞到好处；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不同意对富农等中间阶级打击过重；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他提出要保护和奖励私人工商业。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同志处理国内阶级关系的政策，是不同于左倾路线的。可惜这些思想，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些思想，同确认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是革命的动力，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朋友，应巩固地团结他们，仍是有相当距离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对福建事变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事变无任何革命性“没有丝毫革命意义”^①，就不足为怪了。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活动嚣张时期，人们对正确与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论点的理解，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似乎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是一个娘肚子里生下的双生子，他们同时落地成为冤家，于是两条路线无时不存在，永远也斗不完。其实，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并不一定是同时产生。有时正确路线已形成，错误路线还未产生；有时，错误路线已占统治地位了，正确路线暂时还没有产生或没有形成。此外，正确

^① 毛泽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五期，1934年1月31日。

路线与错误路线，也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根本对立，它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

九一八事变后，政治路线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同城市中心论、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思潮，是带全党性质的问题。这种极左思潮（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还有国际的背景。它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长官意志，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革命的残酷屠杀，同中间阶级叛变革命、反复无常，都有密切的联系。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要化敌为友，要把昨日的背叛者认做同盟者，联合次要敌人反对主要敌人，这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党是在多次的失败和挫折中，逐步总结经验教训，才正确认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阶级关系。这一工作，是在瓦窑堡会议上完成的。

事实说明，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宣言发表前，党中央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在认识上有某些差别，明显的路线斗争，尚未形成。“八一宣言”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基本完善，从这时起，关门主义与新策略路线，形成尖锐矛盾。到瓦窑堡会议，斗争激烈化，发展为路线分歧。

过去认为遵义会议没有能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只有毛泽东同志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正确认识，能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而党中央则尚无此觉悟。其实当时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无论主观、客观条件都是不具备的。一年中，红军每日打仗，疲于奔命，消息隔绝，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知道的极少。在这种情况下，要在遵义会议上形成类似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蓬勃开展

从一九三三年起，法西斯势力在国际范围猖獗起来，形成对和平、民主的严重威胁。共产国际为保卫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制定反法西斯斗争的策略方针，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底到八月底，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由季米特洛夫主持召开的。中国党出席国际七大的代表有王明、康生、陈云、张浩、吴玉章、赵毅敏、孔原、梁朴、欧阳生、周和生等。

国际七大最重要的发言，是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政治报告。报告对国际形势、对法西斯主义的产生、阶级实质等作了分析，规定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新策略。报告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对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具体阐述，指出在中国应“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报告对国际共运中的关门主义作了分析和批判，党号召各国开展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组织形式问题、关门主义问题作了分析。会议过程中，由他起草和发表了《八一宣言》。会议结束后，他又在《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杂志上，撰写了题为《新形势与新策略》的文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依据、党的各项政策（土地、工商业、劳动、政权、外交）的调整，作了论述和规

定。

国际七大，纠正自身长期的关门主义，转而执行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国际策略路线的转变，虽然是适应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但主要是根据国际形势、国际阶级关系的变化作出的，对国际共运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掀起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高潮，形成了东西方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长城。

国际七大闭幕后，为了宣传“八一宣言”，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驻国际代表在巴黎创办了《救国报》，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全文刊载了“八一宣言”。《救国报》因法国当局的无理干涉被迫停刊，接着吴玉章同志被派往巴黎，把《救国报》改为《救国时报》，十二月九日继续出版。《救国时报》发行最多时达两万余份，其中一半寄往四十三个国家的侨胞，一半寄往国内，北平、上海、广州、重庆以至西康、新疆，一些小城市，都有《救国时报》的读者。报纸有时免费赠送，许多爱国知名人士如李公朴、章乃器等都收到过《救国时报》。

在创办《救国时报》的同时，共产国际又派张浩、阎红彦、刘长胜等同志回国，大约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先后相继到达陕北。他们带回“八一宣言”和国际七大的文件，还有电台密码，并恢复了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一九三五年冬，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华北特殊化”；为了反对蒋介石再次妥协卖国而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的。当时党在白区的工作，已恢复和发展起来，北方局设在天津，主要负责人有高文华、柯庆施、李大纲；平、津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有彭涛、黄敬、王学明、姚依

林、周小舟、林枫等；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有黄华、蒋南翔、宋黎等。

一二·九运动，是十年内战时期党所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群众斗争。运动一开始，就得到全国响应，各大城市、许多中小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各报刊、团体，著名爱国人士，都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到来了。

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从各方面为进一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准备了条件。为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党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张浩、邓发、凯丰、李维汉、郭洪涛等。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党在革命新时期的策略路线。会上曾有激烈争论，主要是博古同志坚持过去的关门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对大资产阶级营垒的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反驳。

会议于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主张以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议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调整了党的各项政策。决议还分析了党内关门主义的实质、危害及产生根源，强调它是主要的危险。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以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对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分裂及利用这些分裂的意义，作了精辟分析。报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作了生动、形象的分析 and 概括，并把当时党内统一战线策略与关门主义策略的分歧，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党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完整、最正确的文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它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的形成。会议纠正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曾长期危害革命的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在全党范围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真正蓬蓬勃勃，卓著成效地开展起来。

瓦窑堡会议后的统战工作，采取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相结合，着重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原则进行。下层统战工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在城市各行各业组织各种救国会，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是通过释放俘虏，前线喊话、联欢，派人到国民党军队中作宣传、办训练班等形式，大力开展争取白军士兵的工作。

上层统战工作，首先是争取爱国领袖。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曾先后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主张和活动，并深表敬意。《救国时报》在这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很有成绩的。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都曾给党中央来信，表示拥护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方振武、陈铭枢、蔡廷锴、陶行知等，均在《救国时报》发